

摘要

20 世纪 80 年代，全球贸易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随之而来的是全球第三次移民浪潮。在同一时期，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开始逐步与世界各国建立贸易联系，输出华人移民。2001 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此后的 20 年间，中国进出口贸易和海外移民快速发展。截止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大国，第三大移民输出国，对于全球贸易和移民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回顾现有文献可以发现，早期学界认为国际贸易和移民间为互相替代的关系（Mudell,1957）。但随着上世纪 80 年代国际贸易和移民浪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国际贸易与移民应实为互补促进关系，并对其中的作用机制做出了探索。随着社会网络相关理论的成熟，关注于移民网络与国际贸易的研究逐渐丰富起来，一些国内学者也开始把移民网络的概念引入华人移民与我国贸易的研究中。但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少有研究将我国贸易分解到了二元边际层面，更没有文献检验过华人移民网络影响我国贸易二元边际的作用机制。本文则以此为切入点，收集了相较于现有文献更具代表性的样本数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拓展研究。

本文将移民网络变量引入企业异质性理论框架，构建起包含移民网络变量的扩展引力模型，利用 CEPII-BACI 双边贸易数据和联合国全球双边移民数据库，探究华人移民网络对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华人移民网络对中国出口贸易的二元边际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特别地，当华人移民网络在处于高收入水平国家时，可以显著促进中国出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而在处于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时，则仅对中国出口的扩展边际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当华人移民网络处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时，能显著促进中国出口的扩展边际而抑制集约边际，而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则仅能促进中国出口的集约边际。

本文进一步引入了双边贸易成本这一中介变量，检验了华人移民网络影响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发现华人移民网络存在消费偏好效应和成本克服效应，并且能够通过消费偏好效应直接促进中国出口的扩展边际，而对集约边际无显著促进作用，能够通过成本克服效应同时促进中国出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其中对于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11.6%，而对于集约边际的促进作用则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关键词：华人移民网络；出口贸易；二元边际

目录

| | |
|--------------------------------|-----------|
| 1.绪论 | 1 |
| 1.1 研究背景与目的..... | 1 |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2 |
| 1.2.1 华人移民..... | 2 |
| 1.2.2 移民网络..... | 3 |
| 1.3 研究意义..... | 3 |
| 1.3.1 理论意义..... | 3 |
| 1.3.2 现实意义..... | 4 |
| 1.4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4 |
| 1.4.1 研究思路..... | 4 |
| 1.4.2 研究方法..... | 5 |
| 1.4.3 结构安排..... | 6 |
| 1.5 本文创新点..... | 8 |
| 2.文献综述 | 9 |
| 2.1 国际移民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相关研究..... | 9 |
| 2.2 移民对国际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 | 10 |
| 2.3 移民影响国际贸易作用机制的相关研究..... | 11 |
| 2.4 基于移民社会网络的国际贸易研究..... | 12 |
| 2.5 贸易的二元边际相关研究..... | 12 |
| 2.6 文献评述..... | 14 |
| 3.华人移民及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状况 | 15 |
| 3.1 华人移民发展状况..... | 15 |
| 3.2 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状况..... | 16 |
| 4.理论基础与假设提出 | 19 |

| | |
|---|-----------|
| 4.1 理论基础..... | 19 |
| 4.2 假设提出..... | 20 |
| 5.模型设计与数据来源..... | 22 |
| 5.1 模型设计..... | 22 |
| 5.1.1 二元边际的测量..... | 22 |
| 5.1.2 引力模型的构建..... | 23 |
| 5.2 变量和数据说明..... | 24 |
| 5.2.1 二元边际 ($\ln(1+EM)$ 和 $\ln(1+IM)$)..... | 24 |
| 5.2.2 移民网络 ($\ln(\text{Chinshare})$)..... | 24 |
| 5.2.3 经济规模 ($\ln(\text{GDP})$)..... | 24 |
| 5.2.4 可变贸易成本 ($\ln(\text{Distcap})$)..... | 25 |
| 5.2.5 固定成本 ($\ln(\text{TFD})$)..... | 25 |
| 5.2.6 相对劳动生产率 ($\ln(\text{PROD})$)..... | 25 |
| 5.2.7 其他控制变量..... | 25 |
| 6.华人移民网络对中国出口二元边际影响的实证分析..... | 27 |
| 6.1 描述性统计..... | 27 |
| 6.2 华人移民网络对中国出口二元边际影响的实证检验..... | 28 |
| 6.2.1 总体样本回归..... | 28 |
| 6.2.2 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华人移民网络对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 | 31 |
| 6.2.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华人移民网络对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 | 33 |
| 6.3 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 36 |
| 6.4 华人移民网络影响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机制检验..... | 37 |
| 6.5 本章小结..... | 41 |
| 7.结论与政策建议..... | 42 |
| 7.1 研究结论..... | 42 |
| 7.2 政策建议..... | 43 |
| 7.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44 |
| 参考文献..... | 45 |
| 致 谢..... | 49 |

ABSTRACT

In the 1980s, global trade entered a stage of rapid development, followed by the third wave of migration in the world. During the same period, China began to implement 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began to gradually establish trade ties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exported Chinese emigrants. In 2001, China formally joined the WTO. In the following 20 years,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migration of China developed rapidly. Up to now, China has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country in goods trading and the third largest exporter of emigrants, which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global trade and migration.

Literature shows that scholars considered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migration to be substitutes for each other at the beginning.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migration in the 1980s, more and more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migration are actually complements and facilitators for each other. With the maturity of social network-related theories, studies focusing on migrant's network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have been gradually enriched, and some domestic scholars have begun to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migration networks into the study of China's emigration and trade. However, as far as the current research is concerned, few studies have decomposed China's trade to the binary margin level, and even less literature has examined the mechanism of the emigration network effect on the binary margin of China's trade. This study takes it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collect sample data and conducts some extended research.

This study introduces emigration network variable into the heterogeneous firm model, constructs an extended gravity equation including emigration network variable, and explores the impact of Chinese emigration network on the binary margin of China's exports using CEPII-BACI bilateral trade data and the UN Global Bilateral Migration Database. The study finds that Chinese emigration network hav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binary margin of China's export trade. In particular, Chinese emigration network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 to the binary margin of China's

exports when they are in high-income countries, while only contribute to the extensive margin of China's exports when they are in middle- and low-income countries. When the Chinese emigration network is located in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it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s to the extensive margin and suppresses the intensive margin of Chinese exports, while in non-Belt and Road countries, it only contributes to the intensive margin of Chinese exports.

This paper further introduces the mediating variable of bilateral trade cost, and examines the mechanism of how Chinese emigration network affecting the binary marginal of Chinese expor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consumption preference effect and a cost overcoming effect of Chinese emigration network, and they can directly facilitate the extensive margin of China's exports through the consumption preference effect, and facilitate both the extensive margin and intensive margin of China's exports through the cost overcoming effect. There is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for the extensive margin, accounting for 11.6% of the total effect, and a full mediating effect for the intensive margin.

Keywords: Chinese emigration network; export trade; binary margin

1.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目的

国际贸易和国际移民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既是贸易大国也是移民大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尤其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20年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飞速增长。据商务部统计，在2001-2021的20年间，中国进出口总额从5097.68亿美元迅速增长到了6.05万亿美元，其中在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以4.16万亿美元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目前，中国已和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伙伴关系，并成为其中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

同时，海外华人移民规模也在过去20年间迅速扩大。据联合国经社部2019年发布的关于全球国际移民存量的报告，中国大陆以1073.23万的输出移民成为世界第三大移民输出国，在输出目的国排名前20的国家中，以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占13个，以孟加拉国、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占7个。当今海外华人已遍布全球各个角落，活跃在全球各类经贸活动中，是联系中国与世界各国经贸往来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在推动中国进出口贸易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促进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国际贸易和移民之间的关系历来为经济学界所关注。Mudell(1957)最早在H-O模型的基础上对国际贸易和要素流动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国际贸易和生产要素之间互为替代关系的结论。进入90年代后，随着全球贸易和移民的快速发展，学界开始重新审视贸易和移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国际移民与贸易间实为互补促进的关系，即移民既能通过信息共享机制降低双边贸易成本，又能通过内部治理机制监督合约的执行降低交易

风险，从而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

在我国出口贸易和对外移民不断增加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并为相关贸易和移民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针对华人移民网络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进行一些深入研究很有必要。但就研究现状而言，关于华人移民网络对中国出口贸易规模影响的文献大多停留在进出口总量层面，将贸易结构分解到二元边际层面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在此视角下，对于华人移民网络影响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作用机制的实证检验更是相对空白。此外，由于数据的可得性，现有研究所基于的双边移民和贸易数据大多较为陈旧，难以反映近年的实际情况。因此本研究有以下目的：

（1）从出口贸易二元边际结构的视角入手，探索华人移民网络对于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从出口贸易的微观结构上分析华人移民网络的作用，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2）基于联合国和 CEPII-BACI 数据库最新发布的相关数据，对华人移民网络和中国出口贸易情况进行现状分析和实证检验；

（3）通过对华人移民网络对我国出口贸易二元边际影响的研究，为我国在进出口贸易和移民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方面提供理论支持。

1.2 基本概念界定

1.2.1 华人移民

对于移民这一人口跨国流动的主体，各国际组织、国家主管部门和西方学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国际移民组织将“国际移民”定义为：为了在其他国家定居的目的而跨越国境流动的人群。国际劳工组织将移民定义为：不拥有其就业国公民身份的人。美国的《移民法》将移民定义为：意图放弃原来居住地与国籍，进入美国永久居留并申请成为美国公民的人。加拿大的《移民条例》中，移民是指一个被允许入境永久居留，并在加拿大工作和生活的人。虽然各方对于移民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从以上例子中，可以总结出移民的两个基本特性：一是跨国境流动，二是跨境流动后，在新国家内有一定的居留时间。

由于本研究所选取的移民数据来源于联合国人口司，故本文采用联合国对“移民”的定义，即除派驻到他国的外交人员、跨国驻扎的军事人员之外，在非本人出生国以外国家定居超过 1 年的人。并将华人移民的范围限定为仅由中国大陆地区（不包含港、澳、台地区）对外输出的移民。

1.2.2 移民网络

移民网络的概念源于族群网络（Ethnic Networks），族群网络即以共同的种族或文化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群体。这样的族群网络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方面是网络中的个体会反复地往来交互，以便他们增强互相间的协作。另一方面是族群网络中的成员都对其他成员的特征有着比较全面的了解，因而他们可以更好地识别出对方，或者将外部的生意机会推荐给彼此（Rauch,2001）。移民网络就是一种典型的族群网络。

本文界定的移民网络即指这种居住在母国以外，并通过共同文化、种族等关系而联接起来的有机关系圈层。

1.3 研究意义

本文主要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探讨华人移民网络对我国出口贸易二元边际的影响。本文首先分析华人移民网络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机理，回顾华人海外移民网络的发展状况，再建立起实证模型，通过实证检验华人移民网络对中国出口贸易二元边际的影响，并深入探讨和检验其作用机制。

1.3.1 理论意义

从传统贸易理论到近年来从企业异质性视角发展起来的新新贸易理论，在解释国际贸易时都主要关注企业和贸易对象国间的行为，而较少关注进行国际贸易的微观主体和他们所构成的社会网络，虽然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关注到了这个问题，但目前针对华人移民网络的贸易效应的文献仍不

够丰富，在移民网络的贸易效应研究中引入二元边际结构的文献更是少有，对于其作用机制的实证检验也相对空白。因此，本研究从二元边际结构的角度探究华人移民网络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可以作为现有相关研究的补充，对于其作用机制的实证检验也可以弥补这一方面的空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创新性。

1.3.2 现实意义

现有研究采用的全球双边移民数据多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和联合国数据库，而世界银行每十年发布一次数据，联合国每五年发布一次数据，因此此前的研究所基于的数据大多为2010年前的历史数据，时效性较差。并且就现有关于华人移民网络对中国出口贸易二元边际的影响的文献来看，其数据样本的选取都不够具有代表性，可能导致检验结果的偏差。而本文采用了联合国经社部人口司发布的2000年-2020年每五年的全球双边移民存量数据，其中2021年发布的2020年移民存量数据还未有见刊论文使用，样本在时间维度和样本国范围上都更加全面，因而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对于研究近年的华人移民和中国对外贸易问题而言也具有较好的时效性，能够为中国更好地利用移民网络促进进出口贸易发展提供切实可靠的经验证据，所得的研究结果对于政府的移民和贸易政策制定也具有更强的参考作用，因此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4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1.4.1 研究思路

本文首先梳理阅读了大量相关文献资料，总结了该领域研究现状，并结合相关数据分析了华人移民网络和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国际贸易学和劳动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阐述了华人移民网络影响中国出口贸易的机制以及出口二元边际的解构方法，建立起扩展的引力模型，进而利用移民网络、中国出口贸易的相关数据进行计量检验，并进一步对其中

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对实证检验结果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出口和移民现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1.4.2 研究方法

本研究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探究华人移民网络对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

(1) 文献研究法。文献研究法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全面地认识到所研究的问题，使我们可以从现有研究基础上并总结前人的研究经验，探究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主要梳理了国际移民和国际贸易、贸易二元边际、社会网络等相关研究文献，并对其进行了研读和分析，挖掘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并尝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

(2) 经济计量模型法。经济计量模型法是通过一组联立方程式将各种经济变量联系起来，并以此模型来描述整个经济的运行机制，随后再利用历史数据对模型中的参数值进行估计，预测经济变量的未来数值。本文将华人移民网络引入计量模型，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将中国出口按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进行分解，作为被解释变量，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包含以上二者的扩展引力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主要采用的实证检验方法为泊松最大伪似然估计法（PPML）和混合效应模型下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PPML方法主要是通过指数函数相乘，从而对数据进行权重赋值，使估计结果有效无偏，理论上检验引力模型的最优方法，因此本文首选PPML方法的检验结果，将OLS方法下的检验结果作为对照。

(3) 跨学科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法又称“交叉研究法”，指综合运用多个学科的知识 and 研究方法，对所研究的课题进行综合研究和分析的方法。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以拓宽学者们的知识面和思路，有助于对课题作出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本文针对研究问题，综合运用了国际贸易学、劳动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

1.4.3 结构安排

论文分为七章。

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文章要研究问题的背景、意义，研究思路和方法及其研究重点、难点、创新点和不足。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旨在对移民网络与国际贸易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贸易的二元边际结构等方面的相关文献展开梳理，总结学界研究成果和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并指出本文的切入点。

第三章为特征事实分析，本章将主要对华人移民及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包括华人移民在过去30年间在全球地理分布、性别结构、年龄特征等方面的变化，以及中国出口贸易在过去20年间在出口贸易地域分布和出口商品结构等方面的变化，为后文的实证检验奠定现实基础。

第四章为理论分析和假设提出，本章将重点分析移民网络影响贸易二元边际的作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三点研究假设，为后文的实证检验和机制检验打下理论基础。

第五章为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主要介绍本文扩展引力模型的构建、二元边际的解构、变量的选取与测量、以及相关数据的处理方法。

第六章为本文引力模型的实证检验与分析。在本章会重点阐述本文所用的检验方法的选取、及基础回归、分组回归、稳健性检验及机制检验的结果，并对检验结果做出全面分析。

第七章为结论与政策建议。本章将结合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结果，整理研究结论，并分别在移民层面和进出口贸易层面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同时进一步指明未来的研究方向。

图 1-1 为本文的研究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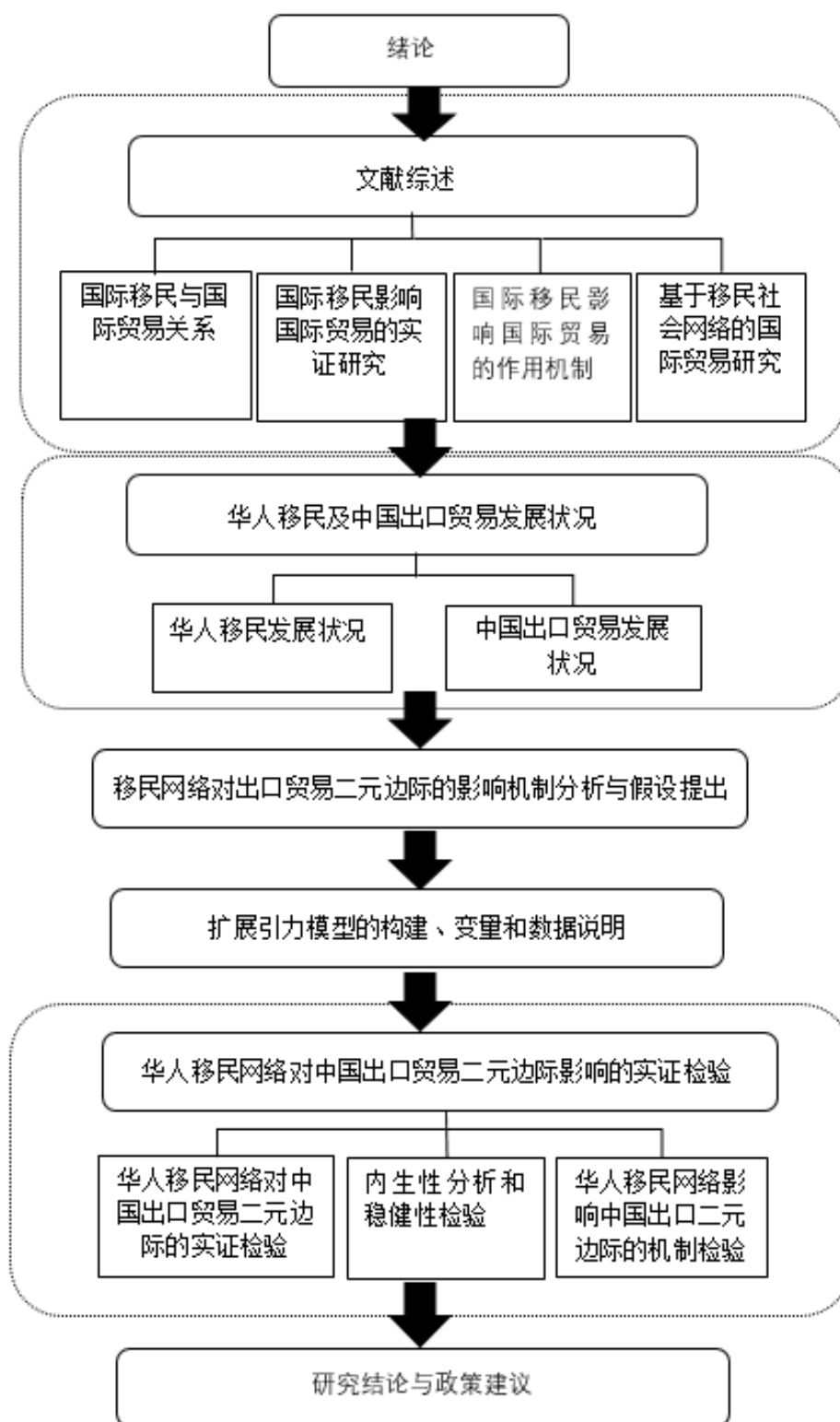


图 1-1 本文研究思路

1.5 本文创新点

本文将华人移民网络变量纳入企业异质性的框架下进行研究，并通过拓展引力模型对中国出口的二元边际进行检验，其创新点主要在于：当研究对象为华人移民网络时，鲜有文献将其对我国贸易的影响分解到了二元边际层面。本文相较于其主要参考文献即张晓毅和刘文（2017、2019）、范兆斌和张若晗（2016）而言，创新性地引入了双边贸易成本这一中介变量，对华人移民网络影响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检验，验证了华人移民网络可以通过消费偏好效应和成本克服效应促进中国出口的二元边际，填补了该研究方向中机制检验的空白，丰富了相关研究成果并拓宽了现有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其次，相较于现有文献，本文在样本的选取上更加全面，也更具有代表性。本文的主要参考文献张晓毅和刘文（2017、2019）仅选取了样本国家2015年的截面数据进行研究，样本数据在时间上代表性较差，而范若斌和张若晗（2016）则仅选取了2000-2013年34个OECD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样本国家范围较小，因而这三份研究的数据都存在代表性不足的问题。而本文的研究样本则包含了中国与118个贸易伙伴国在2000、2005、2010、2015和2020年间的双边贸易及移民数据，相较现有文献而言，在时间维度和样本国范围上都具有更好的代表性。

2.文献综述

2.1 国际移民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相关研究

传统的 H-O 理论认为国际贸易是由国家间的要素禀赋差异导致的，而商品贸易会随着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趋势而减少，故移民与国际贸易间应为替代关系。在该理论框架下最具代表性的为 Mudell(1957), 该研究认为提高两国间的贸易壁垒会促进要素流动，即作为劳动力的移民流动将会增加，最终使两国商品价格趋于均等化，两国间的贸易量减少。相反，限制要素流动则会促进商品贸易，最终使两国要素价格趋于均等化，两国间的移民流动减少，即国际贸易与移民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Straubhaar(1988)发现在欧洲共同市场形成后，在欧共体六国内部，商品贸易替代了移民流动；而在欧共体与非成员国间，贸易壁垒的上升导致非成员国对欧共体的国际移民替代了商品贸易，该研究也将国际贸易和移民的关系指向互相替代关系。

尽管移民与国际贸易间的替代关系得到了部分学者的验证，但对这二者关系的研究仍在深入。随着全球人口迁移和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越来越多研究指出国际移民与国际贸易间应为互补促进关系。Markusen (1983)在 H-O-S 理论框架下系统性地分析了贸易与要素流动的互补关系，该研究认为国际贸易受到经济规模的差异、不完全竞争、税率、科技水平以及商品和要素的流动性等因素影响，并提出在由要素禀赋差异促成的贸易中，商品贸易和要素流动是互为替代的关系，而在由其他原因促成的贸易中，二者间则可能为互补关系。Svensson(1984)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要素比例的一般模型，发现商品贸易和要素流动在可贸易要素和不可贸易要素间存在协同 (cooperative) 关系时呈现出互补关系。此外，Ethier (1984) 认为，在允许生产要素都能按照国际分工重新分配的情况下，为了使生产成本最小

化，生产要素会流向生产产品具有比较优势且密集使用该种要素的地方，由此得出生产要素的国际再分配能够扩大比较优势，从而促进国际贸易的结论，说明国际贸易和移民间应为互补促进关系。Gould(1994)证明了国际移民可以通过共享信息知识和对母国产品的偏好来促进贸易的发展。大约从这一节点起，此后关于国际移民和贸易关系的研究大都将二者的关系指向了互补促进关系，下文将分别从实证和理论两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2.2 移民对国际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

目前已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证实了国际移民对于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Gould (1994)通过检验美国与 47 个国家 1970-1986 年的双边贸易面板数据，证实了国际移民对于双边贸易具有促进作用，其中对于消费品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且该种促进效应会随着移民规模的扩大而递减。Head 和 Ries (1998)检验了加拿大 1980-1992 年间与 136 个贸易伙伴国的数据，发现移民对于加拿大的双边贸易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移民数量每上升 10%会导致加拿大对移民来源国的出口上升 1%、进口上升 3%。在前两者的基础上，Dunlevy 和 Hutchinson (1999)考察了 1870-1910 年间对美国出口的 78 个国家的贸易和移民存量数据，发现了移民对其母国出口具有促进作用。Girma 和 Yu (2002)研究了英国与 48 个国家 1981-1993 年的贸易数据，并按贸易伙伴国是否曾为英国的殖民地数据分组，结果表明来自非英联邦国家的移民对于双边贸易具有明显促进作用。Rauch 和 Trindade(2001)研究发现对于东南亚等华人网络普遍存在的国家而言，至少 60%的异质产品贸易的增加都可归功于华商网络。Greenaway 等 (2007)检验了 1990-2000 十年间 152 个样本国的数据，发现海外华人网络能够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綦建红、鞠磊 (2008)在 1980-2006 年的数据基础上，通过采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发现我国的对外贸易与国际移民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且二者互为因果。

2.3 移民影响国际贸易作用机制的相关研究

移民对于国际贸易的作用机制主要分为三种：群体制裁、消费偏好效应及成本克服效应。Greif（1989，1993）提出在国际法律不健全的环境中，移民网络能够通过群体制裁的方式减少机会主义和违约行为的发生，来促进国际贸易。所谓群体制裁，即若一个人在交易中出现违约行为，那么他将被群体排斥，从而失去与其他人交易的机会。该解释后来再次得到了 Rauch 和 Trindade(2001)的证实。Gould（1994）认为移民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影响双边贸易：一是移民对其母国产品的偏好，特别是对消费品的偏好，能够促进双边贸易；二是移民对母国市场信息的掌握，能够减少语言障碍、合同协商和执行带来的交易成本。Head 和 Ries(1998)证明移民的知识、与母国的联系以及对于母国产品的偏好能够降低贸易成本，进而促进国际贸易。Dunlevy 和 Hutchinson(1999)总结了移民影响国际贸易的三种机制：一是偏好效应，即移民更加偏好其母国产品，特别是工业制成品和食品，进而为东道国进口这种产品创造出市场；二是移民在两国的贸易中充当了“信息桥梁（information bridge）”的角色，他们更能识别出两国间的贸易机会；三是民族网络，移民因与母国人民有共同的文化背景，也更易建立信任，进而在国际贸易中更具优势。Girma 和 Yu（2002）进一步将移民降低交易成本的途径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人专有型（individual-specific）”，即如果双边贸易成本的下降是由移民个人的商业联系或私人关系所导致的，那么不论他们来自哪个国家，其减少贸易成本的效应都是普遍存在的；一类是“非个人专有型（nonindividual-specific）”，如果双边贸易成本的下降是由移民对于国外市场和社会制度的额外知识所导致的，则其减少贸易成本的效应取决于他来自哪个国家，若其母国与东道国的社会政治制度越相似，则其减少贸易成本的效应就会越弱。Dunlevy（2006）在前人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拓展，研究了移民对于国际贸易促进效应的强度问题，结论发现：移民对于贸易的促进效应在东道国更为腐败和两国语言差异更大的情况下更为显著。Metulini 等(2018)还提出，移民网络可以通过“市场熟悉效应”为潜在的贸易伙伴提供信息，从而促进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这种市场熟悉效应本质上也是通过移民

网络间的信息渠道实现的。魏浩和袁然（2020）通过区分华人网络中的直接联系与间接联系，确认了移民偏好机制和信息机制的有效性，表明华人网络可以分别通过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促进中国和东道国的出口贸易增长。

2.4 基于移民社会网络的国际贸易研究

“社会网络”一词来自于社会学，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被应用于社会学研究，后来一些学者将该理念引入到经济学研究中，一般认为，社会网络理论是网络结构交互过程中对个人或者群体产生特定影响的机制（Borgatti and Halgin, 2011），个体的经济行为也会受到社会网络的影响。

近年来一些国内学者开始研究华人移民网络的贸易效应。耿利敏、戴枫（2006）等从机制上阐述了我国华商网络对中国对外贸易的作用。蒙英华、黄建忠（2008）选取了我国与日本、缅甸等 12 个亚洲国家 1980-1999 五年的面板数据，验证了华商网络对中国对外贸易的促进作用，且华商网络强度每增加 1% 会促进中国出口量的 1.622%。赵永亮（2012）依据标准模型（STD）和成本对称模型（STC）考察了中国与 28 个样本国的双边贸易流数据，证实了移民网络贸易创造效应的有效性，并确认了移民网络存在明显的成本克服效应和消费偏好效应。王云飞、杨希燕（2015）检验了我国与 118 个国家的移民和贸易数据，发现华人移民网络主要通过直接效应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且该种促进作用对与我国非同语种国家的贸易更为明显。蒙英华、蔡宏波等（2015）对微观企业层面的贸易数据进行了研究，结果也发现移民网络能够提高中国企业的出口概率和出口强度。魏浩和袁然（2020）利用全球 131 个国家（或地区）的华人网络和贸易数据，检验了华人网络贸易效应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华人网络不仅会通过直接联系促进中国对东道国出口贸易的增长，还能通过间接联系带动不同东道国之间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而言，华人网络的出口贸易创造效应更为显著。

2.5 贸易的二元边际相关研究

Melitz(2003)等人在克鲁格曼的贸易模型基础上结合企业生产率差异，建

立了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模型显示出口市场会吸引生产率水平更高的企业进入，而迫使低生产率的企业退出市场，长此以往贸易会使资源在行业内重新分配并有利于高生产率企业，随着生产率最差的企业逐步退出市场，行业的平均生产率会得以提高。这一研究成功地将一国出口的总增长分解为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两个部分。Amurgo-Pacheco 和 Pierola(2008)分析了 24 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1990-2005 年的贸易数据，发现贸易增长主要由集约边际的增长促成的，而对于扩展边际的增长而言，出口地域多元化比出口产品多元化更重要。在二元边际的计量方面，Kancs（2007）基于一个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推导出了计量模型，对东南欧国家的企业异质性参数进行估计之后展开了二元边际结构分析。

钱学锋等（2008，2010）首次全面系统的研究了我国出口的三元边际结构问题，证实了我国的出口主要是沿着集约边际增长的，并指出经济规模、多变阻力、固定成本、生产率等因素对于贸易二元边际的影响有着不同的机制，其中固定成本主要影响扩展边际，而对集约边际没有影响。陈勇兵等（2012）在此基础上发现：不同贸易成本影响出口二元边际的作用机制和作用程度各不相同，并且经济规模、双边距离和贸易成本的变动主要是通过作用与扩展边际而影响贸易流量的。施炳展（2010）利用中国 1995-2004 年的贸易数据，将贸易增长的分解框架扩展到了三元边际，即广度、数量和价格边际，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我国出口的增长模式。蒙英华和李艳丽（2015）研究了移民网络对中国企业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发现移民网络有助于促进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并且其扩展边界效应大于集约边际效应。范兆斌和张若晗（2016）也将二元边际结构引入了他们的研究中，首次较为全面地探讨了华人移民网络对贸易二元边际的影响，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移民流量和存量均能显著促进出口的集约边际，而对出口的扩展边际则无明显作用。张晓毅和刘文（2017，2019）又在此基础上检验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41 个国家的数据，发现华人移民网络能够正向促进我国出口的集约边际而负向促进扩展边际。

2.6 文献评述

早期学界认为国际移民与国际贸易间为替代关系，该种观点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证实。但随着国际贸易和全球人口迁移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国际移民与国际贸易间实则为互补促进的关系。同时对于国际移民影响国际贸易的机制解释也集中在消费偏好效应、成本克服效应以及群体制裁等方面。近年来，随着社会网络理论相关研究的成熟，一些国内学者也把该理论引入了华人移民与贸易的研究中，证实了华人移民网络对于中国贸易的促进效应。

但就目前的研究而言，还存在以下两点问题：1.由于中介变量数据的缺乏，现有关于华人移民网络对于贸易二元边际影响的研究还未对其作用机制或渠道做过相关机制检验。2.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问题，现有研究多采用的是2010年以前的双边贸易和移民数据，数据时效性较差，而对2010年之后，特别是2015年及之后的实证研究还较少。同时，现有相关研究要么是基于截面数据进行的，要么是只选定少数国家作为样本进行的，因而数据代表性较差，可能导致检验结果存在偏差。有鉴于此，本文将基于以上两点问题做一些补充研究。

3. 华人移民及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状况

3.1 华人移民发展状况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全球人口迁移的规模就随着国际贸易的增长而不断扩大。1990 年，中国对外输出华人移民约 423 万人，截至 2020 年，世界华人移民存量达到 1046 万人，增幅达 147.2%。据联合国经社部数据，中国在 2019 年就已成为全球移民第三大输出国，仅次于印度和墨西哥。从移民目的国来看，2020 年华人移民存量排名前十的国家和地区除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外，其余均为发达国家，包括美国、韩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意大利和英国。

从华人移民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来看，虽然我国海外移民数量在过去 30 年间发生巨大变化，但是移民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结构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1990 年，华人移民主要分布在东亚和东南亚、欧洲和北美地区，这两个地区的华人移民存量分别占华人移民总量的 47.95% 和 39.41%，共计 87.36%。至 2020 年，全球华人移民存量最多的依旧是东亚和东南亚、欧洲和北美地区，分别占华人移民总量的 62.80% 和 28.44%，共计 91.23%。但从变化趋势来看，从 1990 到 2020 年间，全球华人移民分布有向东亚和东南亚以及欧洲和北美地区集中的趋势。

表 3-1 华人移民在世界范围的分布

| 年份 | 1990 | 2000 | 2010 | 2020 |
|----------|---------|---------|---------|----------|
| 世界 | 4231625 | 5884919 | 8714648 | 10461170 |
| 撒哈拉以南非洲 | 18084 | 27405 | 28802 | 29182 |
| 北非和西亚 | 6178 | 24272 | 28948 | 33202 |
| 中亚和南亚 | 182722 | 241453 | 287130 | 293378 |
| 东亚和东南亚 | 2657308 | 3072938 | 4318464 | 5016032 |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 50049 | 66610 | 101066 | 160260 |
| 大洋洲 | 113897 | 202921 | 464616 | 806051 |
| 欧洲和北美 | 1203377 | 2249320 | 3485622 | 4123065 |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移民数据库整理

从移民的性别特征来看，1990年世界华人移民存量中有219.8万人为男性，203.4万人为女性，男女比例为1.08。至2020年，世界华人移民存量中有476.9万人为男性，569.3万人为女性，男女比例为0.84，相比于1990年有明显的下降。

从移民的年龄特征来看，1990年海外华人移民年龄中位数为36.5岁，2020年的中位数为39.1岁，其中在所有统计年份中男性年龄中位数都高于女性年龄中位数，说明华人移民中男性的年龄较女性普遍更为年长。

从移民目的来看，越来越多的家庭为了教育而移民。据2019年US《门户开放报告》数据，2018-2019年中国赴美留学生占留学生总数的33.7%，中国继续成为美国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据《2019年英国留学生报告》统计，中国大陆留学生总人数占英国国际学生总人数的23.2%，是最大的生源国。此外，低龄留学的规模也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过去十年间，中国学生去美国读高中的人数增长了98.6倍，远高于本科水平的14倍，子女教育日益成为中国新中产阶级移民海外的重要原因。

3.2 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状况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更是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2002-2020年，中国的年均出口增速为13.67%，年均进口增速为13.01%。在此阶段，世界货物贸易的平均增速是6.38%。其结果是，中国在2009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在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2001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规模达225.45亿美元，到2020年则扩大到5239.9亿美元，扩大22倍多。

从出口贸易的地域分布来看，中国目前已和全球23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贸易伙伴关系，并成为其中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实现对外出口25906.5亿美元，其中对亚洲出口12310.6万亿元，其中对东盟¹出口3837.2亿美元，对欧洲出口5359.0亿美

¹ 东盟：文莱、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

元，其中对欧盟²出口 3909.8 亿美元，对北美洲出口 4939.6 亿美元，对非洲出口 1142.2 亿美元，对大洋洲出口 647.4 亿美元。特别地，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往来日益紧密，并以年均 7.1% 的增速持续增长，2013-2021 年间的货物贸易额累计达 11 万亿美元，占同期外贸总值的比重也从 25% 增长至 29.7%。总体而言，中国出口市场呈现多元化特征，过去 10 年间不仅对传统发达国家出口保持稳步增长，对新兴市场（俄罗斯和非洲等）和“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开拓也取得显著成效，出口增速较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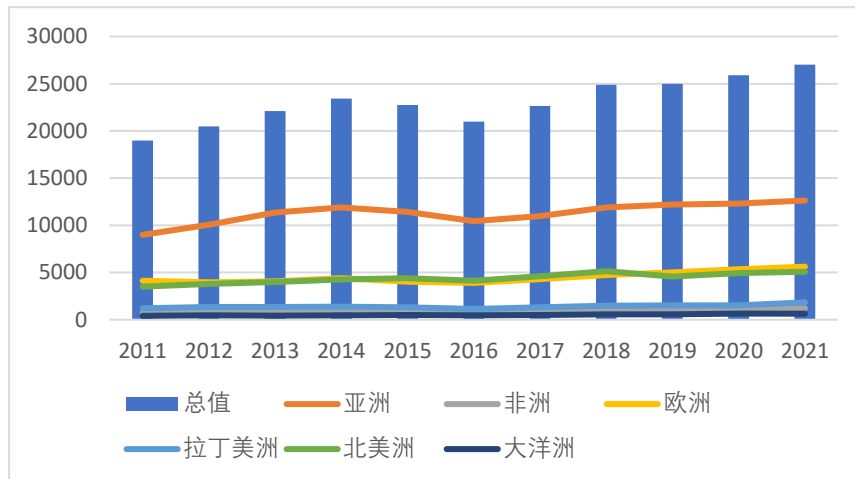


图 3-1 2011-2021 年 10 月中国出口分地区（金额单位：亿美元）³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中国出口商品附加值处于稳步上升态势，出口贸易结构逐年优化，出口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的位置逐年攀升。总体来看，自 2011 年到 2021 年 10 月的十年间，中国对外贸易出口总值不断攀升，其中工业制成品出口总值呈同步增长态势，且终占总值的 95% 左右（如图 3-2）。截至 2021 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63266.0 亿元，同比增长 17.9%；进口 54088.1 亿元，同比增长 14.7%。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也从 2014 年的 12117 亿美元，提升至了 2021 年的 18169 亿美元，增长约 49.9%。此外，2021 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 19860.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9.1%，占我国外贸出口比

² 欧盟：比利时、丹麦、英国、德国、法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奥地利、芬兰、瑞典、塞浦路斯、匈牙利、马耳他、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克罗地亚。自 2020 年起欧盟数据不包括英国。

³ 2021 年出口数据仅包括 1-10 月数据

重达 59%。其中，家电、手机、计算机、集成电路、电子元件、汽车整车及零配件、机械基础件、电工器材等 8 类机电产品出口均超千亿美元。汽车、工程机械、光伏等高附加值产品全年出口增速均超过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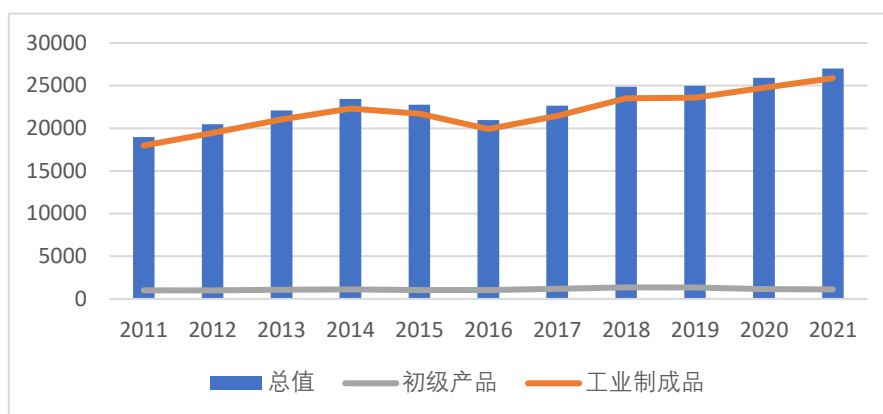


图 3-2 2011-2021 年 1-10 月中国出口商品结构 (金额单位: 亿美元) ⁴

数据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从出口企业性质来看, 2011-2021 年 10 月期间, 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出口额水平较为平稳, 而国内其他企业的出口总额处于稳步提升态势, 对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具有突出的拉动作用, 持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经营主体地位。2020 年全年, 其他企业出口 14508.9 万亿元, 约占全年出口总额的 56%, 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占全年总值的 36%, 国有企业出口额占全年总值的 8%。2021 年前三季度, 中国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达到了 52.7 万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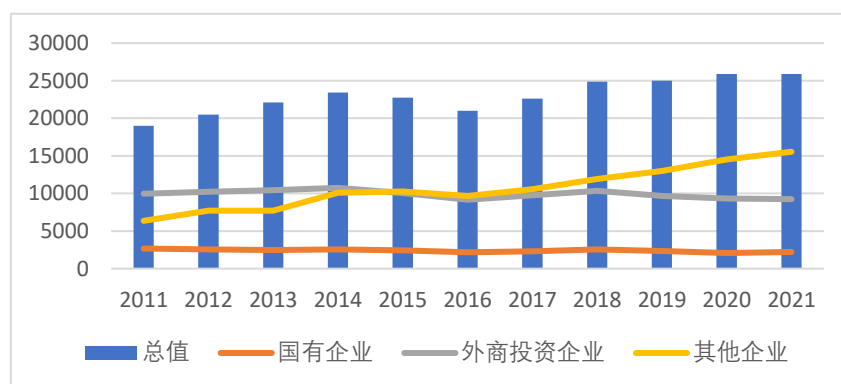


图 3-3 2011-2021 年 1-10 月中国出口分企业性质 (金额单位: 亿美元) ⁵

数据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⁴ 2021 年出口数据仅包括 1-10 月数据

⁵ 2021 年出口数据仅包括 1-10 月数据

4.理论基础与假设提出

4.1 理论基础

传统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国际移民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替代关系（Mundell, 1957; Straubhaar, 1988）。但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移民与国际贸易间的互补关系，尤其是国际移民对于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证实。他们认为传统新古典贸易理论对于国际移民的假定过于机械，忽略了国际移民与来源国的社会联系，这些学者对于国际移民对国际贸易促进作用的解释则大多集中在了国际移民的社会网络效应上。目前，移民网络能够促进国际贸易已基本成为学界共识，而对于移民影响国际贸易理论机制的讨论则主要集中在移民的“消费偏好效应”和“成本克服效应”上。

移民的消费偏好效应指移民对于其母国产品的偏好会直接促进东道国对于其母国产品的进口，即促进移民母国的出口贸易。消费偏好是建立在消费者行为基础上的，是指消费者对特定商品、商标产生特殊的信任，从而反复地、习惯地购买同一商标或品牌的商品（Spenner and Freeman, 2012）。Combes（2005）指出，许多消费者都有一种“本土偏见”，这种偏见可能一方面来源于长期生活在分工化市场中的人们对于以往消费习惯的坚持和依赖，另一方面来源于情感因素，尤其是爱国主义或沙文主义。并且，移民的消费偏好还存在扩散效应，可以带动东道国消费者对移民母国产品产生消费需求（綦建红和鞠磊，2008）。因此，移民流入会对东道国产生额外的进口消费需求，从而直接增大东道国从移民来源国的进口规模（Gould,1994;Head and Ries,1988;Felbermayr and Toubal, 2012）。

而移民的成本克服效应则是移民网络通过减少贸易双方交易成本的方式来促进双边贸易，其作用方式更为广泛，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1.移

民通常是同时掌握其母国语言和东道国语言的双语使用者，在国际贸易中可以通过其语言能力减少交易中的沟通障碍，进而降低交易成本(Gould,1994; Dunlevy,2004); 2.移民网络可以通过在信息渠道中增加信息量的方式减少不确定性，从而促进经贸活动的开展 (Murat,2006)。比如，国家间产品存在异质性，移民可以为东道国带来其母国产品和市场情况方面的信息，进而为东道国降低获取海外市场信息的成本(Raunich,1999; Gima and Yu,2000); 3.由于贸易通常依赖于贸易合约，而移民网络可以通过群体制裁的方式减少违约行为的发生，进而减少贸易谈判和合同执行相关的成本。所谓群体制裁即当一个人在交易中出现违约行为，那么他将被群体排斥从而失去与其他人交易的机会 (Greif,1989;Gould,1994;Rauch and Trindade, 2002)。

近年来个别国内学者也对华人移民网络影响国家间贸易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探索和验证，但总体上依旧沿着上述框架展开。赵永亮 (2012) 将移民网络的贸易创造效应按消费偏好效应和成本克服效应进行了分解，考察了其对中国与 28 个样本国双边贸易流的影响，确认了华人移民网络消费偏好效应和成本克服效应的有效性。王云飞和杨希燕 (2015) 通过将所有国家样本分为有共同语言国家和无共同语言两类，检验了移民网络可以通过对其母国语言的和文化的熟悉成本沟通的桥梁，进而确认了移民网络的成本克服效应。魏浩和袁然 (2020) 利用全球 131 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网络和贸易数据，对华人网络的移民偏好机制和移民信息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确认了这两项作用机制的有效性，并发现促进国家间各类商品增长的主要机制是移民信息机制。

4.2 假设提出

经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移民影响国际贸易的两大机制，即消费偏好效应和成本克服效应已基本得到证实，但学术界的这些理论研究大都是基于对国家间进出口进行整体考量的视角进行的，而直接研究移民网络影响贸易二元边际的理论研究则还较为欠缺。但一般而言，一国贸易的增长是同时来自于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钱雪峰 (2008、2010) 表明中国的出口增长也正是如此，只是从 1995-2005 年的数据来看，集约边际占据的比重更大，该研究还证明贸易成本的下降也能同时促进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增长。因此，我

们可以假设移民网络的消费偏好效应和成本克服效应对于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也是同时通过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实现的。

具体而言，本文提出如下待检验假设：

假设 H1：华人移民网络可以促进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增长，并且这种促进作用与华人移民网络的规模密切相关，华人移民网络规模越大，促进作用也越大。

假设 H2：华人移民网络存在消费偏好效应，可以直接促进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增长。

假设 H3：华人移民网络可以通过成本克服效应促进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增长。

下面本文将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对以上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938035132024006027>